

# 从“对象性活动”到“现实的个人”

##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认识过程的文本学探析

王晓朝,刘伟

(清华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084)

[摘要]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或前后“断裂”的,而是存在一个不断扬弃和提升的过程。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的个人”,尽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对立。相反,正是基于其早期对人的本质“定在”(黑格尔语)意义上的认识,马克思才实现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的变革。因此,任何片面强调马克思在某一时期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或者将马克思早期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同质化于人道主义,都是一种理论上的曲解和僭越。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本质;认识过程;现实的个人

[作者简介]王晓朝(1953—),男,安徽桐城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哲学及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刘伟(1983—),男,山东淄博人,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7)05-0007-05 [收稿日期]2017-02-03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究竟是在认识起点上就一蹴而就的,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马克思不同时期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否存在对立,具体而言,这种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的变化,是否如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所言,存在着一个骤然的“断裂”?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的转变,存在一个由受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到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逐渐转变过程,正是基于这种世界观的转变,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也存在一个由从模糊到成熟、从抽象到具体、从量变到质变的不断扬弃的过程。因此,在不同时期,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的确存在一些差异,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对立。

### 一、马克思世界观成熟以前 对人的本质的初步探索

尽管马克思早期试图摆脱近代西方认识论范式下对人的本质的先验预设,从而跳出“本质主义”视域下对人的理解,但在世界观发生转变以前,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仍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黑格尔认为,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而其内部矛盾是其发展的根源。尽管他对本体的认识已孕育着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巨大的实践感,但其“绝对观念”的

本体论仍是“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的形而上学。在黑格尔所开辟的哲学视域下,费尔巴哈摒弃了“上帝本体论”,从而确立了“感性本体论”。但他在批判宗教时,仍设定了一个“无限的、绝对完善的、抽象的人的本质”,因而仍未摆脱人本主义视域下对人的本质的抽象预设。因此,费尔巴哈的思想仍旧是一种典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以前的马克思,仍处在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的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下,因此,他认为,只要认识到人的现实存在是一种不同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存在,从而一旦扬弃这种异化的现实存在,就可以重新实现人的真正的本质。这些影响表现在马克思早期,如《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关于“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sup>[1] P167</sup>、“人是人的最高本质”<sup>[2] P9</sup>等论述。

在《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这表现在其关于“激情本体论”、“自由自觉的劳动”和“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等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激情,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的本质的活动”,“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sup>[3] P326</sup>。除了人

的本质的“激情本体论”外,马克思还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中,确证了人的本质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另外,马克思还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认为在扬弃私有制的前提下,劳动不再是纯粹为了获得生活资料的生命的物化,更不再是仅仅为了“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相反,劳动成为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因此,“我的劳动是什么,它在我的物品中就只能表现什么。它不能表现为它本来不是的那种东西”<sup>[4] P38</sup>。劳动过程对于人来讲,也不再是一种自我否定,更不再是一种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相反,“我在我的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sup>[4] P38</sup>。因此,我既在劳动过程中“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sup>[4] P37</sup>,又获得了乐趣、愉悦和快感;劳动产品成为我的自由个性的本质被确证和对象化的结果,因而它们“都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sup>[4] P37</sup>。我在对劳动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的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sup>[4] P37</sup>。同时,“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sup>[4] P37</sup>。这是一个由劳动产品的人化而确证我的本质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尽管马克思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人,即无论是人的本质的“激情本体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还是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但可以发现,他都是从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来理解人的本质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并不是作为自然属性先验地或隐匿地存在着,从而等待着我们去拨开迷雾去发现它,当我们发现了它时,就像发现了真理。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sup>[3] P325</sup>换言之,动物与对象之间存在的只是一种同一性关系,它们只需要对象来维持自身的生命。而人与动物不同,人只有借助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从而必须在对象化的实践中,才能确证自身的生命个性和本质力量,并以此成为自己。当然,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主要把“对象化的活动”理解为“工业”,“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sup>[3] P306</sup>。实际上,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才突破了《手稿》中把“对象化活动”简单地理解为“工业”的狭隘性,从而把“工业”这一概念抽象为“实践”,并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可以说,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理论,抓住了认识人的本质

的根本,也是理解马克思人学理论的一把“钥匙。”

## 二、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扬弃和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新高度

在对“人的本质”认识之前,有一个无法回避和必须澄清的问题,即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进行探讨,这样才能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去认识和界定人的本质。这里所谓的形而上学,主要是指自柏拉图以来所开辟的哲学形态和范式,这种形态和范式力图超越感性世界,从而追求一种一元化、非历史的终极本体,并以形式逻辑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对终极本体的形而上学追求,从柏拉图开始,“途经普罗提诺、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一直延续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sup>[5] P28</sup>。尽管亚里士多德曾反对柏拉图对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划分,休谟也以怀疑主义的形式对形而上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黑格尔则试图以“实体即主体”的命题打破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模式,但是,一直到马克思,才实现了对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真正批判。关于马克思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国内外学者也存在分歧和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完全颠覆和终结了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其文本依据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马克思以“世界化”和“解释世界”的哲学瓦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并未终结形而上学,其哲学思想包含着形而上学,同时又开辟了后形而上学。因此,在这部分学者看来,马克思是以一个“继往开来”的“开拓者”和“革新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以上两种观点都不免存在一些片面性。笔者认为,马克思并未抛弃形而上学本身,只是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无人身的理性”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主客对立思维方式,从而转向了活生生的“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因此,马克思在“自在自为”的意义上,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理论自觉。

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对过去人们“独断论”式的认识人的本质的超越,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任何传统形而上学对问题的理解,都不是合乎过程和历史的,而是把作为过程和历史的结果理解为过程和历史本身。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

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sup>[2] P58]</sup> 如果“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那么,人与事物的关系就会重新回到“‘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的关系,即重新回到基于近代认识论探究范式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与被认识的思维范式。而这种认识范式只会把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超越的历史阶段。此外,马克思以“教育者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为例,进一步批判了费尔巴哈的这种思维方式,“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sup>[2] P55]</sup>。实际上,马克思所要强调的是,教育者和环境的关系并不像费尔巴哈所指认的那样单纯静止地存在着,因而“改变了的人”并不仅仅就是“改变了环境的产物”(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等),这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正是基于这种非辩证的和直观的思维方式,费尔巴哈在理解人的本质时,才会“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从而“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sup>[2] P60]</sup>。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主张,环境和人的改变既是一个基于“人的感性活动”之上的辩证互动过程,又是一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基础上的辩证统一过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所提出的“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等概念,不再是从设定人的本质规定出发,而是在描述“人的感性活动”和“实际生活过程”的基础上,即在历史人学现象学的基础上,对人的本质的革命性批判。

同时,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更加抽象化,从而实现了以往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的双重终结。这既表现在对人的理解的方法论的颠覆上,又表现在对人的理解的实质内涵的变革上。任何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无不带有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烙印。马克思虽然未全然否定形而上学,却坚决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和思维方式。所以,马克思用“辩证逻辑”的“过程”中介“形式逻辑”对立的两极:在指认任何现实存在时,都必然用历史的过去来中介;而在指认任何未来时,又都必然用现实存在来中介。事实上,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提出正是这种中介性的“辩证逻辑”在现实中的运用,因为“实践”既是主体见之于客体的对象化过程,又是客体见之于主体的反作用过程,主体与客体在相互交融和作用的过程中实现了统一。

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2] P60]</sup> 在这里,马克思真正突破了对人的本质的“对象性活动”(《手稿》将其指认为“工业”)的理解,而是将“对象性活动”理解为“实践”,从而又在更抽象的意义上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的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于现有的社会历史关系,即使是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被颠倒过来或以虚幻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不可能超出基于历史之上的、现有的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强调,必须在历史人学现象学的基础上,直面由人的本质对象化并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结构(历史继承中的社会)中展开的现实感性活动本身。至此,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 三、“现实的个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新视域

如果说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等概念,还只是一种在抛弃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对人的本质的探讨的理论尝试和理论预演的话,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则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通过历史人学现象学的方法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科学认识。

首先,马克思坚决反对在脱离历史存在的现实的前提下对人的本质任意进行先验性预设。他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因为“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sup>[2] P73]</sup>。相反,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应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他指出“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sup>[6] P545]</sup> 而对这种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的人的分析,又必须回归于其现实的生活过程,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其出发点,因为任何对人的本质的探讨都是一种基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所以“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sup>[2] P68]</sup>。而以往的哲学家就是把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和基于上一代的历史之上的现实作为永恒的基础,从而在脱离社会历史的前提上,对人

的本质进行先验预设的。对此,马克思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sup>[2] P93</sup>。

其次,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历史不在场的直观主义。无论是对于现存的感性世界,抑或是对于人自身的“理解”,以往的哲学家要么求助于对事物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与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哲学直观之间;要么就诉诸哲学家的“眼光”(本体论哲学),即戴上“眼镜”来观察感性,否则,他们便会对单纯直观和单纯感觉之间的矛盾感到束手无策。马克思指出,之所以产生这种形式逻辑的认识事物的方式,源于当事物发展的历史不在场时,人们认识的一劳永逸的直观性。对于费尔巴哈,马克思批判道“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sup>[2] P76</sup>所以,“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sup>[2] P78</sup>。尽管费尔巴哈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sup>[2] P78</sup>。而尽管黑格尔对认识“存在”(本质)的辩证运动进行了探讨,并以此揭示了事物变化和发展的性质,但他并未跳出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从而窒息于客观唯心论体系之中。

最后,马克思完成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人学现象学之上的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的视域转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人和人的实际生活过程、人的感性活动的历史实现境遇以及人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描述,从而提出了“现实的个人”概念,并以之为其整个哲学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sup>[2] P67</sup>他还特意解释说,“这里所

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处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着的”,“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sup>[2] P72</sup>。

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现实的个人”有其社会历史的规定性。同时,马克思也经常强调人的能力、直观感觉、激情等,因此,“现实的个人”又有其价值规定性。按照人的价值规定性,“现实的个人”是个人能力、个人需要及个人价值观念的有机统一体。所谓个人能力,是“个人的、他所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一定劳动的特殊素质或能力”<sup>[3] P358</sup>,是个人在其自身特殊力量的发挥的过程中,将自身独特的个性和思想对象化于物,从而对社会各个方面施加影响,并由此进入其所处的社会的过程;所谓个人需要,既是人与外在世界发生关系时个人的基本需要和个性化需要的满足过程,又是一个“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的过程。在个人需要获得实现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个人能力的确证和认同;在个人能力的个性化发挥和个人需要的多样化满足的过程中,作为自身独立个性的彰显和表达的个人,并不是作为他人的复制品而存在,而是有着自己本真的精神状态,并凝聚为独特的个人意识。而按照人的社会历史规定性,“现实的个人”又是作为一定生产力的使用者、一定生产关系的联系者和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创造者而出现的。个人能力的发展和发挥对象化于外部世界,形成一定的生产力。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生产力的提高是以一定的生产工具的改进为标志的,如蒸汽磨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手推磨所产生的生产力;在个人能力的发挥以及个人的基本需要和个性化需要获得满足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然要组织起来,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sup>[2] P345</sup>。在历时态上,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以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的形式(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等)表现出来;而在共时态上,它又以多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包括社会分层、社会分化和社会分配关系等)表现出来。最后,在个人能力得到个性化发挥及个人需要获得多样化满足的前提下,形成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个人价值,这种个人价值在更高层面上被确认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个人”之价值规定性和历史规定性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张力,因此,两者表现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作为“现实的个人”之价值规定性的个人能力,总是在现有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的现实境况中获得个性化发展和发挥的,因此,“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sup>[7] P305</sup>;“现实的个人”之个人需要,也总是在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之上所展开的日常生活境遇中得到多样化满足的,因此,它“不是从作为自然物的个人的赤裸裸的存在所产生的需要”<sup>[8] P182</sup>;而作为“现实的个人”之社会规定性的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则不断引领和形塑着个人意识及个人观念,因此,“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sup>[2] P291</sup>。反过来,也正是作为“现实的个人”之价值规定性的个人能力、个人需要和个人意识,基于其生存的要求和人的本质对象性的需要,不断否定、挣脱和超越其现实生存境况,生发出作为历史过程的日常生活世界,并构成了现存生活世界作为历史过程的第一动力。

综上所述,一方面,就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的关系而言,它并不是在形而上学视域内对人的本质的一种同质性的新的递进,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对人的本质的探讨的理论革命和视域转换,因而也是对以往传统

形而上学的哲学独断论式的人的本质理论的终结;另一方面,任何对事物的认识都存在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也概莫能外。就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理解而言,无论是《手稿》中人的本质力量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和“激情本体论”,还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都是马克思在对象性活动的理论基础之上,对人的本质的“定在”意义上的认识。尽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对立。任何片面强调马克思在某一时期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或将马克思早期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同质化于人道主义的抽象认识,都是一种理论上的曲解和僭越。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From “Objective Activity” to “Individuals in the Reality” ——Marx’s Process of Cognition of Human Nature

WANG Xiao-zhao, LIU W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Marx’s cognition of human nature underwent such a process as constant abandonment and promotion. First, in his book of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Marx proposed “objective activity” from the human essential power. Second, in his book of Theses on Feuerbach, Marx thought that human beings are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Third, in his book of German Ideology, Marx proposed “individuals in the reality”. In different times, Marx proposed different concepts of human nature, but these concepts are not conflicted. Those who emphasized on Marx’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or regarded Marx’s early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as humanitarianism, had a wrong understanding of Marx’s theory.

**Key Words:** Marx; human nature; process of cognition; individuals in the reality

[责任编辑、校对:何石彬]